

川陕苏区报刊宣传事业探析

代维

(四川民族学院 旅游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 川陕苏区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坚持出版了数十种红色报刊,用以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鼓舞教育人民大众、团结革命进步力量。苏区的红色报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完善的组织机构管理特点。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况,苏区报刊做到了因地制宜与通俗易懂相结合,同时所刊文章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在充分发挥红色报刊的宣传革命思想主阵地作用下,苏区宣传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红军规模急剧扩大,民众积极参加革命。最终推动了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工作的开展,体现了文化宣传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 川陕苏区; 红色报刊; 宣传事业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1-0096-05

“宣传教育工作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重要环节,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1]。民众“阶级意识”愈发达,其革命性愈加主动。可见,宣传工作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将其视为宣传革命理念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重要手段,这种重视宣传作用的态度也在川陕苏区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

川陕苏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与川陕人民共同建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川陕苏区因其地处“巴山之天险,扼汉水长江之咽喉,向南发展可以截断长江,虎视武汉;向北发展可以据汉中而制西安;向西发展可以打通甘肃、新疆与苏联联络;向东发展可以联系湘鄂西及鄂豫皖赤区”的战略要地,成为“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2]40}。川陕苏区因其重要战略地位和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南京国民党当局和四川大小军阀的极度恐慌。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四川军阀对根据地采取了军事进攻与反动宣传相配合的“围剿”策略,妄图消灭苏区、消灭红军。为打破敌人封锁围剿、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根据地军民也采取相对应的策略。除积极进行军事战斗之外,也大力实施革命宣传教育。其中创办红色报刊是苏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环节,利用报刊向根据地军民宣传革命思想,团结军民同心协力反“围剿”。据不完全统计,

在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先后出版《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干部必读》、《红军》等20多种油印报刊。

一 川陕苏区报刊概况

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和《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两项决议,决定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任主席,杨孝全、罗海清为副主席。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川陕苏区的报刊与根据地一起诞生。在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成立伊始,中共川陕省委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就将宣传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明确提到“党的一切组织发展,都基于斗争中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因此,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3]7}。《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也对宣传事业做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各级机构和军队团体“必须将苏维埃的理论与实际,经过……文字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

“党对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苏维埃问题、红军及一切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宣传煽动工作”^{[3]7}。尤其是在红军初到川北地区,面对当地人民对党、对红军了解认识不深的局面,加之又有敌对势力的恶意宣传,工作的开展得十分困难。在此严峻的形势下,

大力实施宣传教育,广办报刊使广大民众认识党、了解红军,宣传的党的思想主张尤为必要。于是,一大批革命报刊蓬勃兴起,蔚为大观。

在川陕苏区最早出版的报纸是《川北穷人》报,创刊于1933年1月。初由赤江、红江两县联合主办,并作为两县苏维埃机关报发行。是时,川陕省委与川陕苏维埃政府初建,并无自己的专门报刊。直到1933年8月,“《川北穷人》改名为《苏维埃》”,《川北穷人》才结束其历史使命,先后共出版30余期。至此,川陕苏区的报刊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创办了各种类型报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报纸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干部必读》(1933年8月上旬创刊,1935年6月中旬停刊,共出版127期),是指导川陕根据地各项工作的重点理论刊物,主要供军内高中级干部阅读。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后,开始向地方高中级干部发行;少共川陕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1933年8月创刊,1935年4月终刊,约出版80期),该报主要面向根据地青年群体,刊登文章内容丰富,范围广泛,“重点是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团的工作和青年运动,加强对青年进行形势、任务和文化教育”^{[4]254}。《共产党》为中共川陕省委机关报,于1933年8月上半月创刊,在1935年4月终刊,约出版100多期;《苏维埃》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1933年8月创刊,1935年4月终刊,估计出版了100期左右^[5]。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机构也主办有自己的报纸。如,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川陕省军区政治部机关报《战场日报》,出版240期后改名为《红军》。另外,西北军区政治部还不定期出版《红军画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办的《血花》,红四军政治部主办的《红色画报》,红三十军政治部主办的《赤色画报》、《赤化全川》,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办的《红光》,红九军政治部主办的《不胜不休》,红三十军政治部主办的《红星》,红四军政治部主办的《红旗》。川陕省总工会机关报《斧头》,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经济建设》,川陕省工农医院政治部主办的《小日报》。这些报刊对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斗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推动了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二 川陕苏区报刊宣传事业特点

(一) 政治倾向性明显

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坚持以革命手段推

翻反动统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产业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愈发达,则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必愈扩大。民族解放运动中渗入此阶级的性质,这个运动才能格外深入,才能增加他的革命性质。我们的任职,便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6]。民众的阶级意识、阶级精神提高对于其参加革命行动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川陕省委明确提出“对群众应马上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同时为了增强党的革命主张影响力,最迫切的就是“加紧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将党的“政纲与主张”在“斗争中”宣传和组织^{[7]26-27}。这样的宣传无疑会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具体在宣传中就是要突出革命性、斗争性。

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中,首先提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他要领导整个无产阶级与农民”,实行“党员军事化”,“砸烂旧世界”和“完成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最终“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主张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此外,张国焘在《川北穷人》第9期对共产党与苏维埃以及红军所面临的任务也有所论述。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宣传的革命性与斗争性。

在川陕苏区的发展、壮大乃至鼎盛过程中,革命战争是主流。因此,宣传事业必须紧扣发动革命群众参加革命这一主旨。如在《苏维埃》报第21期一次性刊发的《热烈拥护苏维埃举行全省游艺体育大会》和《赤江城红场体育运动》两篇体育报道都提出广大青少年要“练习体育”“强健身体”的目的是“打到刘湘”、“消灭刘湘”^{[7]106}。这充分表现了苏区报刊宣传的革命性特征。

在这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宣传特征之下,苏区宣传成效明显,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宁左勿右”过激倾向^[8],如“只要是反对革命就‘捉’就‘杀’”^{[4]15}。这种宣传方式无疑会对苏区的革命事业带来不利影响。

(二) 完善的组织机构领导

川陕省委和红军政治部极为重视革命舆论宣传和群众文化活动,多次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先锋”。多次号召军队“在进行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坚决战争中,我们要百倍加紧宣传工作来夺取群众”^{[2]108}。历次省党代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军队领导机关都把办好报刊,搞好宣传事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出讨论,形成决议,付诸实施,并组建了专

门的机构负责宣传事业的实施。

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党的各级组织部都建立宣传部”,“建立党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这一系列机构的成立使各种资源得到整合,使苏区的报刊宣传工作有了坚强后盾,报刊出版事业发展更加迅速。配合苏区赤色邮政网络,报刊不仅在苏区内部发行,也逐渐传播扩展到相邻白区。

除专门的机构主管宣传外,还对党员提出了要求。“宣传工作必须成为每个党员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的工作。”并指出:“要使党的宣传能扩大深入群众,必须每个党员工作,乃至每个赤色工会会员,都能切实负宣传工作责任,反对党内流行的以为宣传是擅长文字与理论的一部分干部分子的专责之错误见解。”^[9]党员的参与为苏区的报刊宣传事业注入了新的力量,也使宣传受众面得到扩大。

另外,红军和苏维埃领导也十分重视宣传事业,“亲自撰稿,亲自选稿、审稿”,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曾中生和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都曾发表《干部问题》、《培养干部的提案》、《我们需要铁的纪律》和《实行党团员军事化》等文章。同时一些报刊的编审工作也由各级领导干部充任。张国焘负责西北军事委员会机关刊物《干部必须》审稿。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省委秘书长吴永康负责省委机关报《共产党》审稿。省苏维埃秘书长黄超、杨克明负责省苏维埃机关报《苏维埃》审稿^{[4]163}。

完善的组织机构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参与不仅对于宣传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对于根据地整个革命事业的高涨也是举足轻重。

(三)因地制宜,通俗易懂

川陕苏区地处一隅,域内大山绵亘,交通闭塞,信息不畅,远离中心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的边区,也是文化的边区。这里长期封闭落后,民众也穷困不堪,文化水平低下,文盲众多,对于革命主张更是从未知晓。张国焘直言道,“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10]“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11]。这为苏区的宣传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也预示着必须采取有别其他地区的宣传方式。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将共产党的政纲与主张,最浅近、最通俗、最明瞭、最生动的……去宣传”^{[3]3},即“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

的群众化。”^[9]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深道理、大道理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百姓听,让老百姓更加直观深刻了解,使报刊宣传工作与民众实际情况相契合。

在川陕省委编印的《资本主义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一文中,就以老百姓身边“地主”“佃户”例子描述资本主义的严重剥削程度,“地主家把田佃给客户子,十背谷子,主人得六背,客户得四背”。“资本家请人做活路,说两吊钱一天,一天做的活路足有十吊钱,八吊钱给资本家剥削去了,还假装说没有剥削人。资本主义的剥削规模要比地主高利贷大得多”^{[3]186}。

同时报刊在刊文时在保证严谨准确之时也积极采用川北方言。将苏区根据地比喻为“房子”和“船”,反动势力是进“房子”和“船”抢劫打人的“棒老二”^{[4]163},而共产党是“船里掌舵的人”。张国焘更是形象地把红军称之为川北人民“抱的儿子”,“那个抱儿子会耍刀,会耍矛,打得特别好”,只有“亲兄弟一样背靠背的打敌人,……不分亲儿子、抱儿子,我们才能消灭敌人”^{[3]15-16}。这样的语言通俗易懂,群众乐意接受,便于领会。

在宣传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宣传内容也有所不一样,各有侧重,“在宣传中紧紧把握苏区党和白区党的宣传工作的共同点和不同点”^[12],注意彼此区别。对“被我们俘虏的士兵,要很好优待他和加强对他的政治鼓动”,“火线上对白色士兵要扩大宣传,一方面印关于白色士兵痛苦的歌谣……另一方面要告诉他,不要给军阀当走狗,苏维埃才是他们的出路”,“叫他拖抢过去投诚”。而在苏区内部则需要将“发动苏区人民执行战斗任务和宣传党的纲领、主张和革命道理结合起来”。宣传重点是“提高苏区人民的觉悟和斗志”。

在这样的情形下,采取有针对性的宣传,并使用“棒老二”、“抱儿子”等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生活的宣传语句,抓住了“赤区”、“白区”民众的心理,民众乐于接受,能够获得其认同感,宣传成效显著。

(四)内容丰富,目的明确

川陕苏区的报刊虽然都是由党政机关和军队团体主办,但从现存的报刊来看,刊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根据地方方面面。

党和苏维埃的宣传。“党要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最重要的条件是能获得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党的口号之下,形成伟大的斗争的力量。”^[9]“党的一切组织发展,都基于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党对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苏维埃问题、红军以及一切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宣传工作”^{[3]17}。因此,宣传党、扩大党的影

响力对刚入川的红军来讲迫在眉睫。根据地的众多报纸都多次对党和苏维埃进行介绍,如在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机关报《川北穷人》中,就曾刊发《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斗争纲领》、《什么是战斗委员会》等多篇文章,其他诸如《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共产党十大纲要》、《区苏维埃各部工作》和《地方党团苏维埃经常工作方式提要》等也大量刊发。此外,也对根据地的一些政策进行了介绍,如《苏维埃经济政策》、《苏维埃的外交政策》。根据地民众和红军战士通过这些报刊对党和苏维埃、红军了解更加深刻,认识更加全面。

土地革命宣传。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内容。能否正确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革命政权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成败。在《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一文中,苏维埃阐述了土地的重要性,认为土地是“穷人的命根”,对土地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也不避讳,指出了分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阐明分土地与“消灭刘湘”的关系,只有“深入土地革命……动员全体群众去打敌人,消灭刘湘……才能保住土地、房屋”^{[31]133}。这种宣传报道不仅突出了土地革命重要性,也大大提高了根据地民众参加革命保卫革命果实的积极性。

经济建设与社会改造的宣传。在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战争是主流。只有后方稳固,才能为苏维埃同军阀作战提供助力。在同反动势力作战的同时,苏维埃仍不忘对根据地进行建设和社会习俗进行改造。苏区的报纸也对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重要性进行宣传强调,提出“要把经济工作当为日常中心工作之一,……务期达到苏区每个工农群众都知道经济建设之意义”^{[4]153},如《目前中心工作》、《加紧春耕运动和戒烟运动》和《加紧识字运动》。同时很多报刊所载文章也介绍了社会建设方法和建设成就,如红军财政委员会主席,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的《我对财政经济之意见》就指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对妇女解放和发展苏区文化科学知识也有所宣传。通过这些宣传,苏区妇女觉悟提高很快,参加红军积极性高涨,也对根据地的其他各项事业推进有所帮助。

苏区报刊刊登的内容也不仅局限于川陕苏区,还刊登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是国际上的相关消息。

“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决定一切的,土地革命是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经济建设是胜利的保证。为此三者服务,是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2]苏区在进行宣传的时候紧扣着三大任务,围

绕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进行宣传,宣传成效显著,有利的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 川陕苏区报刊宣传事业成效分析

红四方面军虽然在1932年底顺利从汉中地区进入川北并击溃守敌,并在次年二月建立了革命政权,但这主要是利用了川东北军阀田颂尧部与川内其他军阀争夺霸权,川北地区处于势力真空的有利契机。随着革命势力的壮大,四川军阀再次把目光投向川北地区。在1933年1月底,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便任命时为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集中数万兵力,“拨给子弹100万发,军费20万元,并派4架侦察机助战”^[13],要求其全力“围剿”红军。而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边区转进过程中经历多次战斗,部队损失严重,待其入川时,红军仅有一万四千多人。同敌人相比,红军处于明显劣势地位。

同时,在红军入川之前,反动军阀利用川北人民不了解党、不了解红军的情况,就已开始对党和红军采取了污蔑宣传,称红军入川是“人民罹空前浩劫”,“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劫”^[14]。1933年12月,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成立,并直接听令于“剿匪”总司令部,此机构其职责“商承四川缴费总司令办理剿匪区……宣传各事宜”,对红军进行污蔑反动宣传。其宣传组于1933年12月6日“举行学界演讲大会敦请学者前往”,向重庆市学生做“大规模剿匪宣传以期唤起青年学生认清匪党罪恶,共同消灭赤祸”^[15],向根据地宣传“红军是鄂豫皖过来的,我们打红军与穷人无关”,营造红军是“匪”的舆论氛围。

在这种负面消极舆论宣传之下,民众对红军的观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有关民众逃离苏区的事件时有发生报道,影响了后方的稳定和根据地的巩固。这些都为红军在边区进行进行革命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展开了针对性舆论宣传,在根据地大办红色报刊,以期挽回这种不利局面,重拾民众信心。苏维埃党政军在根据地先后办有20多种报刊,既有面对军队报刊,也有面对普通民众的期刊,部分报刊甚至运送到了白区发行。事实证明苏区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宣传效果明显。

以民众动员民众参加红军来讲,成效最为显著。“在川北苏区的扩军是有成绩的,部队由四个师一万六千余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扩大到十万人左右”^[16]。国民党四川当局也对红军宣传成效有所报道,“红军一到四川,以各种深切人民痛苦的标语相号召,于是四方人民景从,莫不深受其宣传之迷惑,

故红军能如此所向克敌也”^[17]。此报道虽有诋毁之嫌,但从侧面也反映出红军宣传成效之明显,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苏区的宣传鼓动之下,民众也踊跃捐赠物资。如在《共产党》第31期就曾报道,在巴中县青江渡列李卢大会上,民众捐赠有“三十条猪,草鞋六百三十双”,赤江县“肥猪二口”^{[3]189}。

同时,苏区的报刊宣传事业也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陈旧习俗得到改善,对于苏区移风易俗塑造新的生活风尚大有裨益。

川陕苏区的报刊宣传事业工作,是在面对苏区“困境”的一种“自救”行为。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成果令人瞩目。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通过《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和《干部必读》等报刊传播到巴山蜀水地区,为苏区民众了解党、认识党起了很大的作用,影响动员了数以万计民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其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值得肯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苏区的报刊事业在革命战争环境之下,囿于敌人封锁、资源匮乏和苏区民众的文化水平低以及办刊主体单一等不利因素,苏区报刊仍处于较低水平,有待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树荫.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宣传工作思想述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5(5): 71-82.
- [2] 四川文史资料委员会.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21辑[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 [3] 刘昌福, 叶绪惠, 等. 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Z].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4]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钞分会. 红色号角—川陕苏

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5] 沈果正.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J]. 新闻研究资料, 1987(4): 137-146.
- [6] 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卷[EB/OL]. [2014-10-31]. [http://cpc. people. com. cn/GB/64184/64186/66627/66627/4489257. html](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27/66627/4489257.html), 1924-5.
- [7] 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整编委员会. 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Z].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6.
- [8] 朱晓舟. 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宣传试探[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4(2): 103-104.
- [9] 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5卷[EB/OL]. [2014-10-31]. [http://cpc. people. com. cn/GB/64184/64186/66634/4489617. html](http://cpc. people. com. cn/GB/64184/64186/66634/4489617.html), 1929-6-25.
- [10] 张国焘. 我的回忆[M]. 香港: 明报月刊, 1971: 1086.
- [11] 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8: 169.
- [12] 顾德成. 壮丽画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 [13] 李健, 张喜庆. 论川陕苏区创建的艰巨性[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67-73.
- [14] 经世寄. 川北赤祸真象记[J]. 社会新闻, 1933(7): 105.
- [15] 王明前. 20世纪30年代四川新军阀混战和反共战争中的战争动员与善后救济[J]. 军事历史, 2011(1): 44-46.
- [1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 川陕时期·上[Z].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3: 47-48.
- [17] 叶德升. 四川共匪猖獗之由来及其前途之危机[J]. 青年军人, 1933(16): 11.

Analysis of Newspaper Propaganda in Sichuan-Shanxi Soviet Area

DAI Wei

(Sichu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angding 626001, Sichuan)

Abstract: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arduous struggle, Sichuan-Shanxi Soviet Area insisted on publishing a number of red newspaper, to publicize the party's thoughts and ideas, encourage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and unite the revolutionary progress education power. The red newspap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vious political tendency and perfect organiza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area, propaganda made it suit one's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combined with being easy to underst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ent is rich, and the purpose is clear.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revolution propaganda function of the red newspapers, Soviet propaganda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revolutionary ideas spread, the Red Army scale increase, and people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revolutionary. It pushes to carry out the Soviet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e work, and reflects the great role of cultural and propaganda work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Key words: Sichuan-Shanxi Soviet area; communist party newspaper; propaganda cause